

现实主义的理解，好像文学要像新闻一样，做一个全纪实性的反映，但我想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应该是这样的。

2008年汶川地震，我就在成都。老家阿坝州也是震区，我开了两天的车，盘山回去。目睹过非常震撼的死亡场面，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，也看到人类在自救和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。

我去过许多灾区，一万多人口的映秀镇伤亡过半。山清水秀的北川县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，剩下一多半全部损毁。再往北，青川县东河口，山体崩塌，把一个村四个村民小组184户人家、一所小学全部掩埋，700余人被无声无息地埋入地下。

当时和麦家倡导，他和我加上杨红樱发起了捐款。麦家还在成都工作，他拿出二十万作为首笔捐款，杨红樱也捐了二十万。我家在农村，负担多，只能表示心意，捐了五万。最后很多人参与捐款，这笔基金最后达到百多万，定向给阿坝州教育局，想贡献一点力量，参与建设一所希望小学。

后来因为各地政府对口支持建设学校，一省支援一个重灾区，一个地市支援一个乡镇，我们选定建校的乡，由广东一个地级市负责。在他们的援建规划中，学校自然是重中之重。我们的那笔捐款，最后给了四川映秀漩口中学作了奖学金。

我是一个志愿者，我也是个作家，想写点东西。自己写的东西，怎么和新闻记者写的东西区别开来？那个时候，网络媒体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，但是一个人想知道的资讯，媒体基本上都已经全部提供

了。摄像机没有拍到的和没有写到的那些情景，深度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所能够叙述的场面，我也看到了。问题是我不能重复，后来出现的很多文学作品，就遭遇到我担心的这种情况。当然，面对这种突发性，媒体怎么反应，可能现在也没有结论。但是我至少不会在媒体都已经充分报道的地方直接再下手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

第二个，本身讲故事这件事情，新闻也可以做，电影电视也可以做，也并不是只有小说才能讲故事。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，小说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因为古代理由很充分，你没有影像，媒体也很落后，或者是没有媒体。那小说，它就是全新的艺术。

张英：这一找就是十年。《云中记》后来是怎么找到的？

阿来：确实很困难。2008年5月12日，我在成都家中写小说《格萨尔王》，下午2时28分，楼房开始摇晃，震动从地板从座椅下涌上来，差点把我摔倒在地上。抬头看，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，还喷吐出股股尘烟。我和儿子冲到楼下，混入惊惶的人群。当时通信已瘫痪，楼道被封锁，只能坐在街边的车中，静待消息。当天晚上，我靠着越野



左图：《云中记》。

车上的野营装备，在公园支了一个帐篷睡了一晚上。

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，在我老家阿坝州的范围。我们那个县，我家那个村也经历了剧烈摇晃，但房没倒，也没有人员伤亡。只有三妹妹带车跑长途，她和一车乘客正在震中附近，幸运的是，我妹妹带的一车乘客，无一伤亡。妹夫从成都出发徒步进山去寻找，妹妹弃车带着旅客往外走，半途遇到前去接应的妹夫，徒步一个通宵加一个半天，走出余震频发的重灾区。

在成都的西门汽车站，见到妹妹和妹夫，我以为我会流泪，但没有。他们也没有流泪，只是以超乎寻常的平静，讲述如何在长夜里穿行几十公里破坏严重险象环生的山路。讲到路上房倒屋塌的老百姓，在露天用大锅煮粥，周济路上逃难的人群。

讲一个小故事。地震后抢救人有一个救援时间，先说是黄金24小时，就是希望第一天能够把被埋的人救出来，又说是黄金36小时，后来又变成72小时，最后到100小时……有个别被救出来的人在地下呆了超过120小时。但那是极其个别的案例，被埋在下面100小时的时候，生命救援就已经结束了。

那几天见到的死亡太多了，我所在的镇子有13000多人，其中一半都死了。当时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：中国人不知如何对待死亡，对于死亡很难表达出一个恰当的情感。比如，孩子死了，家长哭晕过去，被抬到帐篷里输液，强行灌点吃的，醒过来他又回到那个地方继续哭，我们在旁边的人很难对死者表达一个恰当的情感，都不知道怎么对待死亡。我相信，很多死者的家庭成